

历史进程中的 中国与世界

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 2012 卷

(中卷 中国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进程中的 中国与世界

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卷

(中卷 中国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

——以越南北使的“入华行纪”为中心

陈国保

一 引言

越南朝贡使臣自镇南关入清以后，沿途依其见闻而做的记录，不仅是他们回国复命的必备述职材料，还是越南王朝了解清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信息渠道。而他们北使期间对于中国的观察和了解，更是越南处理中越关系、制定两国邦交政策的重要依据。所以历代越南王朝都非常重视入华使臣的选拔及其在华途中的燕行记录。留心上国政事，访闻天朝事状，也因此成为越南如清使臣的重要政治使命。越南统治者渴望能从燕行使臣的行程记录中获取有关清朝内政外交的重要信息情报，这在自主心态更为强烈的阮朝尤为突出。而那些肩负着两国邦交使命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大多也不敢马虎敷衍，他们一方面自己观察；另一方面还通过与清人的访谈以及摘录报纸的相关内容以收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国情信息。

尽管相较于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越南如清使臣流传下来的北使文献更多的是北使诗文集，“入华行纪”则较为有限。不过，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几部《燕行记（录）》^①，包含的内容也相当丰富，留下了沿途城市、山川、府县、风俗、社会生活等自然人文地理景观的大量记载，正如乾隆朝如清使

*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20090460811），并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文化交流研究”（12CZS07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据刘春银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一书（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2）所收录的越南北使文献目录，其中包括8种燕行记、80余种北使诗文集和8种北使程图。

臣黎贵惇的《北使通录》所云：“《北使通录》四卷，僕随笔所记也，始于奉命始行，终于度关修聘，讫于回朝，奏启、表本、书简、文移、手帖、尺牋、应对、谈论，皆在焉。……僚友多访中州事，疲于应答，辄指此录示之。”^① 由此而论，发掘越南“燕行文献”这一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材料，透过越南如清使臣在华期间以其所见、所闻、所观、所感、所论而构建的“异域之眼”中的大清帝国形象，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在越南赴京使臣与清代中国社会互动的特定历史情景中，从微观个案和宏观整体的结合上重新审视和认知清代中国社会的真正特性，打破传统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想象下的自我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清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揭示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在本质。

对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古代中国周边同文国家保存下来的域外汉文典籍的文献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已越来越重视。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即曾撰文提倡通过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研究，运用“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② 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在利用越南“燕行文献”的具体研究方面，主要是从越南使臣的北使诗文着眼，讨论中越之间的汉文学交流以及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汉文学与形成于越南的域外汉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刘玉珺、张宇等，分别通过宏观与微观个案的研究讨论了越南使臣与中国文人诗文交流的普遍情形和具体形态，从文学的角度为清代中越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③ 国外学者亦利用越南“燕行文献”等汉文典籍就中越关系史、越南贡使的人物个案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美国学者 Liam C. Kelley、韩国学者刘仁善便着重利用北使诗文、《大南实录》等汉文文献讨论了中越朝贡关系的实质，并从入贡使臣的角度分别阐释了古代越南在中华文化圈中的附属地位和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学人诗文交游的真实心态。^④ 越南学者丁克顺则

① [越]黎贵惇：《北使通录·序》，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79。

② 参见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③ 参见刘玉珺《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学交流》，《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张宇：《越南贡使与中国伴送官的文学交游——以裴文禔与杨恩寿交游为中心》，《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

④ 参见 Liam C. Kelley, “Whither the Bronze Pillars? Envoy Poetry and 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hip in the 16th to 19th Centurie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America, December 2001; [韩]刘仁善：《19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东北亚历史杂志》第6卷第1期，2009年。据东北亚历史财团网站：<http://www.historyfoundation.or.kr/chn/>。

从如清使臣阮辉侯的在华活动、使华著述入手，通过微观个案的考察，分析了越南使臣对清代中国文化的感受以及对当时中国的了解程度。^① 中外学者基于越南汉文典籍的具体研究，虽已取得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越南“燕行文献”的挖掘、利用和研究还较为薄弱，现有成果多侧重运用“北使诗文集”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中越汉文学交流或两国关系史等方面的探讨，而于燕行记、北使程图等资料的使用则明显不够。特别是对于呈现在越南使臣这一他者之视野中的天朝异域形象的解读，更是少见。为此，本文拟以晚清越南使臣的“入华行纪”为中心，通过其中所记录的晚清越南使臣在华期间对于当时中国的观察、认识和评论来探究晚清中国社会的诸面相及掩藏在朝贡礼仪背后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邦交实质。

二 留心地方政事

晚清越南使臣自镇南关入清以后，多取道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入京。沿途所经地区既有繁华都市，也有山野小村，他们所接触的既有满汉权贵，也不乏乡间布衣，这为他们更加全面、细致地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晚清时代，他们使华期间对中国地方政事的微观记录和具体描述，为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当时中国地方社会的实相提供了多维的视角。

众所周知，道光以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吏治的腐败更成为晚清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端之一。越南如清使臣在行程中对于晚清地方官员的贪污腐化之风也多有留意。如道光十七年（1837）十二月，使臣范世忠在回国途中经广西省境时便描写了当地吏治中的陋规恶习。

回到广西省，见内地通事叙称，两广总督邓廷贞移文定于本年正月中旬抵该省辖，因问之。该员称，今年是大计之年，总督大员例得三年一巡，察核官吏，假如广西省向例，知府一、州县三、学政四，由该员自行考覈勤体，至如前途驺从船艘，供应颇属太广，每州县寻常照应仿约三四千银两之外，方得充需，不然则摘出别事革削，以此，州县望风惶惧，或以病告或以老告，抚院堂亦虑失察之咎，听其告假各等语。嗣

^① 参见〔越〕丁克顺《阮辉侯及其1765年赴清朝担任使者时编著的书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第405—412页。

而，一路舟行，所过州县，间有新任员粘有代理员名帖，有无帖者，其事略与该名所言相符。^①

明清以来针对地方官员推行的三年一次的考核制度，即所谓“大计”，本是为了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肃贪求贤，整顿吏治，至晚清却变异为地方官员接待上级的沉重财政包袱，稍有不周，则可能被借机革职。因此，广西州县地方官员为求保身，竟在两广总督三年一巡的查核之际，纷纷告假离岗，而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广西巡抚也为了避免承担失察之责，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亦听之任之。道光时期的吏治败坏，由此可见一斑。更甚者，官员的贪腐，俨然已成困扰晚清中国政府的一大症结。正如越南使臣潘仕俶等回国后向阮翼宗禀报的那样：“同治亲政以来，政事则一遵成典，专用旧臣官吏。则自咸丰以来，仕途掺杂，贪冗多而民生日促，捐纳为之弊也。”厘金的课征便是其中之一。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由于清政府传统的最大税源田赋和地丁以及漕粮都大大下降，同时关税、盐课也无法征收，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军费支绌。为了筹集军饷，清政府开征厘金。厘金之设，原本是基于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需要而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筹饷策略，但在天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逐渐转变为正式的税收制度，^②成为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合法”手段。对于晚清中国政府推行的这种税收政策，越南使臣在经过广西境内时也有一些记录。如同治七年（1868）九月十四日早，赴清使部阮思僊等自梧州府城出发时，即见到如下情景。

诸船户纳税厘金局，半日不清，不得行……厘金局者，乃咸丰六年有旨，抽厘济饷，太平府而上所过州县，皆有厘局，似于巡司征榷之外，别有抽厘之令。盖增取于商民，以助军饷也。旧例，贡使船过司，免检。此行诸船户间有附带米粒、药物，苏抚巡院恐其多带盐货走私漏征，札飭长短送及沿途巡司厘局严行盘检抽征，故所至厘局，巡司人逐船踏勘，不胜其扰。中朝所重者盐课，而抽厘济饷，亦不得已于理财。

① [越]范世忠编《使清文录》（附李文馥《周原杂咏》），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757。

② 任智勇：《同治初年的关厘之争——以江南四榷关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奉行之下，有无病商，不可得而详知也。^①

同治十年（1871）二月二十六日，范熙亮部将船停靠在广西省厅巡司时，也看到了类似情形：

两岸各设厘金局，闻之有警，则列船以铁锁联之，上列板通往来。官私船只过此，勘验，仍待三五等日，乃开，中间数船放行，今则亡也。厘局乃咸丰六年有旨抽厘金济饷，太平府而上所过州县皆有之。盖隐取于商民以助军饷也。旧例，贡艘免检，司人恐船户多有漏带私货，故逐船踏勘，乃放行。问之商者，无不怨嗟也。^②

根据以上二位越南使臣的描述，显然晚清政府在广西境内沿水陆交通要道设有数量不少的厘金局，而且征课对象广，名目多，就连本应免征的贡船，亦不放过。这种设卡抽厘的征税政策增加了来往商民的负担，扰民困商，受到时人的怨愤指责。

晚清中国政府，正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结伴而至，国力日衰，地方动荡，国家危机重重，而此时的越南王朝也面临着与清政府相同的命运。在此背景下如清的越南使臣自然非常注意了解当时中国的地方形势。如道光十六年（1836）如清岁贡使部范世忠等便一路如此，他甚至向随行的船户打听清政府地方时势方面的情报。

行在船户，原系湖南人，该等言属省庆顺府有一人姓赵名金龙，有道士藏形之术，在八排山聚众至数万余人，该循用前明朝服式，其头发留而不剃，所居之人属湖南省，东连广东、西夹广西、北接江西，内十有二峒，极是险峻，四面壁立，兼有平原旷野可以耕植，现今方招兵买马积谷屯田，未曾下山剽掠，以此，台省虽略闻知，第因路险，亦且置之不问等语。嗣回抵广西省城，闻有买得《平徭纪》《八排山徭新文》二集，查之《新文》，言赵金龙逃逸，不知生死，《平徭》略言，赵金龙殄毙无疑，二人说似相牴牾，并此并存。^③

① 〔越〕阮思儒：《燕钅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852。

② 〔越〕范熙亮：《范鱼堂北槎日记》，越南汉喃研究院阮椿燕抄本，A. 848。

③ 〔越〕范世忠编《使清文录》（附李文馥《周原杂咏》），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1757。

范世忠了解到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发生在今湖南江华等地的赵金龙率领的瑶族起义。起义持续半年左右，后被清军镇压，赵金龙英勇牺牲。范世忠能在桂林见到对这次事件描述的书籍出售，说明起义在当时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只是民间成书自然少不了演义的成分，所以说法也就不尽一致。

太平天国和广西天地会被清政府镇压以后，起义军余部先后往中越边境一带撤退，并进入越南境内，其中以天地会的吴亚终部势力最大，引起越南当局的恐慌。所以同治七年（1868）阮朝遣黎峻、阮思侗等如清朝贡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剿”。如同治七年（1868）七月初一越南国王在给广西巡抚苏凤文的咨文中云。

越南国王姓为咨呈事。本国仰荷天朝封殖，世守疆宇六十七年于兹。照之境上高、谅等辖原与上国大郡接壤，八九年来，沿边土匪窃发多处，间或越界扰掠边方，民苦之。本国节次兵勇堵剿，奈匪党去来飘忽，日滋月蔓，龙、陈一带胥为奸窟。饬经打仗，边吏不敢越境。夫以天朝土地之大、兵甲之众，临此么么小丑，压卵何难？惟乱绳徐理，未暇搜山，致此瓯脱之区，犹闻伏莽。本国节呈贵部院会剿，因以道途修阻，音问弗达，会师之期，日月以冀。乃者高平守臣奏称，降匪谢静川、刘士、吴阴线，逆首吴鲲，即吴亚终，聚党数千，袭据仓屯。本国经即增派兵象进剿，贵派谢继贵亦率师来会战，腹背夹击，一鼓而落阳屯围解。以此波照盛情，铭镂无既。嗣闻谢将副道承檄回，服匪现退仓屯，凭险旅拒攻之未拔。吴鲲不时往来归顺，合党聚守鬼营三窟，鸱张四顾，自非扎根。捣虚使他首尾冲决，何以早馘戎首，肇敏肤公。且逆匪一日未除，则边民未得一日安枕。郊畿申画，彼此虽已截然，而彼此均依天朝赤子。本国边吏不职，责无可辞，贵部院仗钺临边，幸赖仰体大皇帝柔远至德，及早增派大队兵勇分向龙、陈、归顺，直捣巢穴，披其心腹，剪其羽翼，彼进退路绝，飞走计穷，穴蚁釜鱼，安所逃命？于以早绝凶丑，永静边氛。想贵部院帷幄筹边，应亦策及此矣……辄因下价进京，道谒辕门，具由布达。^①

对于退据越南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等省一带的天地会余部，

^① [越]阮思侗：《燕轺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852。

阮朝迅速做出了反应，数次派兵前去镇压，但多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广西这边，亦未松懈，一方面悬赏缉拿吴亚终，“广西巡抚部院苏示。照得逆匪吴亚终被剿逃窜，现匿越南木马一带，亟应悬赏严拿。无论内地以及越南军民人等，能将吴亚终生擒解镇安大营或太平府，立即由营由府赏银八千两，如梟首验确实者，立赏银四千两。贼伙中有能及正擒解刺杀，亦照此数，急赏五品项零，余贼概准免罪归农。本部院言出惟信，各宜恪遵无违，特示（同治七年七月十一日）。"^① 另一方面派兵追击，并与越方配合腹背夹击，虽一时奏效，但在清军从边境撤兵之后，吴亚终部继续盘踞越北地区。无奈之下，阮朝国王只得借朝贡之机请求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清廷，请求清政府出兵相助。考虑到活动在越北地区的这股军事力量“不但使越南在这一地区失去控制，也对清朝在边境地区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② 所以清政府答应了越南阮朝政府的请求，派冯子材率军出关援助。

担负着“边事之请”这一特殊使命的阮思僊，在华行程中对于刚刚经历十余年社会动乱的清朝地方形势显然也十分关注。他不仅在途中了解“匪乱”对中国地方社会的影响，并对一路因战争毁坏而导致的荒凉景象多有描述，如同治七年（1868）八月一日，阮思僊行至凭祥州途中即见：

自关抵州，一路荒山乱坡，土石相杂，土民多栽松，上山下涧，泥淖遍路，无异行凉山道中。兵火之后，处处残破，官房民舍，以至诸塘汛，坏者未修，废者未复，殊觉满目荒凉。^③

同治七年八月八日，抵达太平府城的阮思僊，亦看到：

太平府为匪党蹂躏日久，城闾缺坏者未及修，民间房店，处处废毁，月中所见，灌莽载道，盖比旧十只一二耳。城中县堂仅存，府堂毁于贼，现侨寓城外丽江书院。^④

而当他经过南宁府城时，曾经“府城内外，屋舍栉比，商贩辐辏，昔称小南京”的南宁城，“今承兵火余烈，访之十仅四五云”。十二月三日，阮思

① [越]阮思僊：《燕貂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852。

② 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第43页。

③ [越]阮思僊：《燕貂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852。

④ [越]阮思僊：《燕貂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852。

侗等人的船泊靠汉阳府，使部于汉阳书院停驻。他说：

年前贡使公馆在汉口镇，自经兵燹，残毁未复，加以西洋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通商汉口，湖北督抚列宪不欲使部与洋人居止相近，故令于汉阳城中设馆。（汉阳县卞差）吴增又言，府城年前为贼兵蹂躏已四次，至今城内外屋宇萧疏，残垣毁瓦塞满街巷，鄂省城亦然，黄鹤楼兵乱颓毁，今现重修未完。

十日，在从汉阳往汉口的水路途中，只见汉水“岸上列庸，商贾皆以万亿计。惟沿途家屋多有新造未完者，大抵兵火之际，玉帛子女所在，亦不知几番蹂躏者也”。十七日，阮思侗在信阳县城停歇，“城中民家，大半茅茨不完，亦有砖墙瓦屋，上盖以高粱秸者，盖久经兵火，物力凋残故也，沿路自开胜关北，大抵如此”。此等凄凉，阮思侗在其“回程行纪”中也多有提及，如同治八年（1869）五月十四日，当他渡过潞水河，经过河南叶县旧城时，看到“潞南久经兵火，闾里萧条，自此至裕州、南阳略同”。而自裕州城西南行，“田地荒杂，重以积年兵火之后，闾里残破，物力凋瘵。”^①十八日，在他回抵南阳府城时，眼前的这座昔日規制高广，屋宇联络，商贾辐辏，堪称汴南一小都会的重镇，“但经匪残破，犹未复尔”，均可见自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来，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晚清地方社会已残破不堪。除沿途留意访察晚清地方形势外，阮思侗等人还在京城向人打听相关信息。如他就曾向清朝翰林李文田问起清廷的“剿匪”近事，“伊言江浙乱离，为纪略者亦多，然流传京中甚少也。湘乡曾国公（曾国藩）捕获伪王李秀成，供词一卷，自始至末，皆了了，已有旨命缉《平定逆匪方略》，初开馆，约六七年方成书。”又问“捻匪”事，“据伊言，捻匪据城戕官，捻匪但摠略不据，乃流寇耳。捻者，河南、安徽两省土语，犹云合也。贼自云捻匪，故即以名之，去岁已为李相国（李鸿章）尽歼之矣。”^②不过，清政府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但实际上内乱并未平息，各地反清斗争仍在持续。由此也生动地反映出士大夫阶层对于当时地方起义的反应，他们为明哲保身，往往不敢直言时势，而是刻意粉饰太平。

① [越]阮思侗：《燕韶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52。

② [越]阮思侗：《燕韶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852。

三 笔谈探问朝政

古代中、越虽属同文之国，但在语言上因地域的差异并不相通，所以负责语言翻译的通事便成了越南如清使团的必需成员之一。不过，越南使臣通常出于其行程方便的考虑，也为了提高其燕行记录的准确性，他们往往并不只是依赖通事的辗转翻译，还借助笔谈等手段直接与中国人的交流。因此，除了眼观所见，越南使臣一路往返，亦通过笔谈访问的途间咨访，广泛搜罗晚清朝政的相关情报。如同治八年二月十二日阮思侗就曾在京城向前来馆舍拜会的翰林李文田打探同治朝政。

因问大皇帝己未亲政。伊言，两宫垂帘听之，枢庭则恭亲王也。大皇帝未亲政，以圣学尚须纳谏故耳。伊又言，圣人天禀，直（真）我朝隆福，即今春少雨，一祷即应可见。以列圣故事考之，可望康乾两朝昇平矣。^①

同时他又向中国人打听，得知“两太后垂帘，一是慈安皇太后，乃文宗显皇帝（咸丰）所立皇后，一是慈禧皇太后，亲诞帝躬，同治改元，始上尊号”等事实。同治十年九月初三日，越南使臣范熙亮也于京城向广西宁明州举人甘梦陶问起：

再问大皇帝己未临政，二宫视朝何如？多官引见何如？云乾清宫内皇居中，二宫垂帘于后，分左右坐，引见者拜于庭外，正宫是慈安，西宫是慈禧（禧），诞育皇上（同治）。二宫甚贤惠，去年有西宫太监往山东犯法，经奉旨梟首，一事可见。问大婚、临政期，辅政诸事。言明年婚期，已选进宫女，立后是何人，未详。临政之期，不能知也。辅政是恭王，掌军则七王。^②

看到这些材料，或许我们会感到很惊讶，为何一直对清朝国政极为敏感的越南王朝，此时却对辛酉政变之后的清朝政局如此陌生？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以后，越南使清的道路被阻断，中越双方的朝贡关系也

① [越]阮思侗：《燕轺笔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852。

② [越]范熙亮：《范鱼堂北槎日记》，越南汉喃研究院阮椿燕抄本，A. 848。

因此断绝。黎峻、阮思侗部如清，连同补进携带的前三届例贡仪物是四贡并进，距离上届使部来华时间已隔16年之久。两国邦交关系的隔绝，自然也就切断了越南了解清廷的信息来源，导致越南对清朝政局认知的隔膜。而李文田、甘梦陶对越南使臣问题的回答，也反映了清朝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谨慎心态，既顾及国家颜面，又害怕惹祸上身，显然他们的回答并非当时清朝宫廷政治的实情。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说明越南使臣的行程所记，亦非完全确实可靠，不能一味视之为信史。对此，我们不妨再看看阮翼宗与如清使臣裴殷年的一番对话：“翼宗嗣德三十一年（1878）四月，如清使裴殷年等回，抵京入见。帝问曰：清国主少，又政出宫闱，不知所行如何，国内亦得安帖？殷年奏言：内有恭亲王和硕辅政，外则诸总督亦多能臣，国内安宁，盖由于此。”^①裴殷年部关于光绪朝政认识的片面性，不由多说矣！

当然，在与越南使臣笔谈交往的中国人中，亦有知无不言的，如与范慎通、阮述相识的陈钧平便是其中一个。阮述《往津日记》记载：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日）陈菱舫（名钧平，江苏扬州府高邮州人，原候补知府分发浙江省，告病寓居天津）就馆笔谈。菱舫下笔滔滔，言论洒洒，多识世情，且谙军务。余问何以家居不出？菱舫言自少束发受书，屡困场屋。道光年间遭捻匪之乱，家资荡尽，不得已投笔从戎。由军功出身，非其志也。且近来仕途甚杂，至有目不识丁，亦能夤缘高位。他秉性迂拙，不合时宜，故亦无心进取，行将归老林泉，春雨催耕，秋灯课子，长为农夫，以没世耳！余悲其言，惜其遇，亦为之叹息焉！^②

陈钧平的身世，可以说是晚清乱世饱受战乱之苦的民间家庭之社会生存实态的缩影。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清朝吏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正如越南使臣所了解到的：

各省候补，无有体例。如本有差使，则批给薪水，可也。现在李相（李鸿章）营务处候补道员数人，有每月薪水二百两者（粤匪投诚），有

① [越]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59，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1，“翼宗嗣德三十一年（1878）四月”条。

② [越]阮述撰、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35页。

一百两者（军功出身），有六十两者（进士出身），有四十两者（举人出身）。现在文书中，粤匪、捻匪投诚者甚多，皆得好差厚禄，殆亦风会一受也。用人去留、薪水多寡，皆出强吏主见，朝廷不问也。现在强吏专权几似唐之藩镇。^①

多事之秋的晚清王朝已偏离人才选拔的正常轨道，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地位反而不如叛乱投诚或行伍出身者，“大体科第出身者，此间不甚重也”。^② 作乱招安、弃笔从戎，应是获得升迁的最佳途径，社会甚至出现尚武轻文的风气，也难怪清末入华的越南使臣途中看见不少武举考试热闹的场面，而在所谓乱世造英雄的动荡时代，民间习武者更是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视之为博取功名的捷径。

在这种时代风气之下，寒窗苦读的陈钩平本想通过文场科第成就功名，逢乱世家道中落，不得已只好“逐流”弃笔从戎，由军功擢候补知府，但他并不视此为获得功名的“正途”。他报国无门，抑郁不得志，心理的落差使得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充满不满和痛恨，而与异国之臣的笔谈交流，正好成了他针砭时弊、发泄心中怨愤的、不用顾忌的倾诉对象。他与越南使臣的笔谈如下。

殿试不取中，不徒以文理，亦重字学，择其写得好者，递十本进呈御览，三鼎甲暨二甲一名，传胪均出此中。余六本亦必得翰林，其他俟引见。时分用有用主事者，有用中书者，有用知县分省候补者，其不用者，则曰散甲进士，须十二年后以知县补选，如上科积压人多，几终身无选期。倘愿改授教谕，或可到班，然主事、中书二项，其补缺之期亦难乎其难，中书尚易，须七八年，主事则须十五年后。现在人数太多，恐二十年不补者，尚不乏人。

.....

知县七品，不拘正途，捐纳现在多有加銜者，不过百金即加同知銜，挂朝珠，打红伞矣，不然则用蓝伞。

进士用知县，谓榜下，即用知县到省后，补缺较快，约在二年内外。如先用翰林，至下科考散馆，留馆者则曰经济，散馆者即用知县，

① [越]《见闻杂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100。

② [越]《见闻杂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100。

到部候选，四十日后见缺。即选实官，比之榜下，即用尤快。至其食俸与捐纳同。俸银无多，另有养廉名目。如中秋，知县侍俸、养廉约共六百金，大缺有千金者。现在部库支绌，均照六成发给。好在知县无论繁简，多有陋规，如江苏省上海、青浦、南汇三县，一年可余十余万金，不可谓非美缺。直隶优缺较少，极优者，每年不过一二万金。^①

以上诸言，无疑均是晚清政坛的真实写照。一方面科举入仕的待补官员壅滞积压，“中朝诸省候补员人甚多，皆自备资用，无有官俸。惟年有差使，则拨给薪水银两。然事权不一，诸省或以官阶分多寡”；^② 另一方面政府卖官鬻爵，登进冒滥，流品猥杂，贪污腐化成风。如本为清朝官员冠饰的花翎，“不论军功，如文员随驾打围，及国家大婚礼、丧礼皆可赏，但须五品以上方得。若蓝翎，则非有军功及河上填筑决口与水争力等，不得赏也。道光年间，官场有翎者极少，百不有一。今则无人不翎，且花者尤多。光绪五年以前，捐蓝翎一枝三百两，花翎一枝六百两。天津富家，无人不花翎也。”^③ 国家吏治腐败不堪，所以连远在异国他乡的越南统治者也曾就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局势以讥讽的口吻对待臣说：“清国政事，近来殊无可观，朕昨日览清国京抄，见有支银给予英吉利，府库钱几空，何萎靡也。甚至卖官鬻爵，无所不为，而盗贼、雨雹灾异频仍，意者其季世乎！”^④ 由此更可见越南统治者对晚清中国国情可谓了如指掌。

再如陈钧平与范慎通、阮述关于清朝时政的一番笔谈，也为越南使臣提供了许多光绪朝的信息。

中朝定制，皇上起居，皆有一定之时，虽欲晏逸，亦不可得。现今皇上冲龄，亦四更即起，五更临朝，退朝后即须入学房，饭后又须习武，约申末即睡矣，终日无一刻闲。现在皇太后垂帘，临朝时，皇上坐中间，不发一言，太后在旁内门垂帘，朝见大臣跪于帘前奏事，每日皆须临朝，如无召见，即不临朝，然军机大臣帝有召见，或在便殿均可。如皇上亲政，即须自往军机处自批奏件。皇上今年（1883）十三岁，再三年即大婚亲政，盖定例也。

① [越]《见闻杂录》，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100。

② [越]《见闻杂录·候补人员》，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100。

③ [越]《见闻杂录·花翎蓝翎》，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100。

④ [越]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卷46，“宪祖绍治五年（1845）正月”条。

军机处，总揽天下诸务，凡事皆须由军机过目，大军机（如中堂、尚书、侍郎）预参国政，小军机（如中书、主事、员外、郎中）执笔起草，须由军机，始分各部，即古之枢密院也。军机衙门，即在内阁衙门内，凡事由军机进呈御览，然后遵旨而行。

中朝四相（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体仁阁大学士或东阁大学士）、两协办，皆称曰中堂。现在左宗棠授东阁大学士，则文渊阁不放人矣。拜相最难，非翰林出身不能，从无一四五十岁大拜者。如李中堂系有军功，藉以酬庸耳。如左中堂系举人出身，更绝无而仅有者。现今大臣有名望者，除李（鸿章）、左（宗棠）二相之外，尚有刑部尚书阎敬铭（陕西省人，进士出身），新授兵部尚书彭玉麟（湖南省人，生员出身），广东总督曾国荃（湖南人，曾文正公弟），山西巡抚张之洞（直隶省南皮县人，探花），皆名臣也。^①

为掌握当时中国的政治大势，以便抢占处理两国关系的先机，越南使臣对于晚清朝政实态的打探，事前自然是经过了一番周详缜密的筹划，可谓颇费心机，所以除探听上述清廷要政外，军队方面的情报也必然是其笔谈关注的重要话题。而天津使馆内差官张葆廉与范慎通笔谈中谈道：“贵国（越南）取兵于民，各有定额，是存古意。若中国则惟听其自投，或其人好欲立功，或衣食不足，则投居营兵，于民原无定额，惟旗人无论兄弟几人，成丁即有钱粮充旗额，若旗人作官，则别有官俸。中国通国兵额六十余万，旗兵不在此数，八旗最多，人皆为兵，自周岁即食粮，京师饷单，八旗左右两翼闻至四十万，现在额兵饷不能足，步兵每兵终岁不过十两，马兵每兵终岁不过十八两，若营勇，则以月计，每月有三两九、四两五、五两四不等。营勇不在额兵之内，每岁饷项，为数浩繁，颇费筹画。”^② 其中就透露了清末中国军队的尴尬境况。由于清廷在兵源上并无严格把控，投身军队的人只是将此视为获取功名的途径或谋生的手段，这样从军兵员的素质自然便是良莠不齐。加之，晚清国力衰弱，兵饷发放严重不足，势必引起军心涣散，因此清廷所谓的百万之军，不过徒有其数字而已，根本不具备战斗力。

① [越] 范慎通：《往使天津日记》，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471。

② [越] 范慎通：《往使天津日记》，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 1471。

四 晚清时局的观察与评论

19 世纪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主观想象中的天朝上国形象的传统中国，在被动地卷入西方殖民扩张之后，其形象不断受到冲击。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攻势，强弩之末的晚清王朝往往是穷于应对。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兵之后的复杂时局，也时刻牵动着仍与清廷维系着形式上宗藩关系的越南王朝的敏感神经。如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事刚起，越南明命朝便即刻做出了舆论上的反应。

如（广）东南兴船派员公回，言清总督林则徐与红毛（英国）拒战，各有死伤，未知孰胜。帝谓侍臣曰：红毛兵船不过数艘，林则徐以全省之兵，何乃攻之不克？况红毛涉海远来，何所资粮而能久与清人相拒？岂有内为之应，有所恃而敢然乎？是不过为此顽黠之态，以示其慢耳。大清当初以一旅取天下，兵力何其雄也，此又何其萎靡也，朕心实为之不平。且红毛前者为商贾而来，所以构起兵端，盖以林则徐检出鸦片，抄没船货故耳。朕闻北朝皇子、藩王、文武大臣俱吃鸦片，城门市肆亦有公然排列，其国如此，何以律外国乎？^①

次年（1840）正月，阮圣祖再次在朝堂之上与群臣评论中国时局，说：

帝谓兵部参知黎文德曰：近闻清国与红毛相攻，经六七月未能取胜，夫以堂堂大国天下之所瞻仰，始则失信以招兵，终则老师而长寇，成何事体？虽事在彼国，而朕亦不能忘怀，以我国与清朝接界，从来财货百物贸易流通，今红毛为梗，则洋程不通，民间所常用如药材、北茶类者，从何取办，此既病商又病民也。又问阮知方、李文馥曰：尔等往年如东，观他卒伍兵仗如何，而红毛乃敢顽梗如此？对曰：清人械仗恰与事神仪卫一般。帝曰：兵贵精不贵多，广东兵仗若是，红毛人往来商贩已素知之，故敢与之抗耳。尔等岂不观诸京抄，清人一岁囚丁至二三万，其臣若民多犯吃鸦片者，此禁既严，人必多怨，红毛伺其隙而乘

① [越]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208，“圣祖明命二十年（1839）十二月”条。

之，清人亦不能不为之虑也。又曰：朕尝观清将关天培《筹海一集》，见得清人不但文臣多尚文词以饬其才，如武将亦习用此术，彼集中所言，不过饬诈以欺世人，何关实用？不然红毛侵扰，何不将操演机略以破之，而狼狈若是。询之清人，亦言天培督战，一闻炮声便走，则将略果安在哉！且当局者迷而旁观者瞭，他人得失不必深辩，如我国将臣能保其无天培之用心而不为他人之议论乎！^①

随着晚清国力的衰弱以及越南王朝对晚清时局的深度观察，相较于清代鼎盛时期越南流行的盛赞天朝物力的普遍崇华心态，此时的越南对于自己长期朝贡的“宗主国”的心态已明显发生变化，正如学者所说：“一旦中国的力量削弱，朝贡体系难以维系，这一时期的中华世界秩序不过是虚构而已”。^② 看到清政府与英国在广州交战的被动局势，当时在阮朝第二代君主明命帝统治下的、姑且可说尚处于发展时期的越南王朝，对于清王朝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只是从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表现了对事态的关注，但以其政治身份而言则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姿态，丝毫看不出它能从本国与清王朝还存在的宗藩关系这一特殊的政治情结出发而应有的同情心，或鸣不平，它甚至是站在一个优越者的立场来发表言论，对晚清中国时局冷嘲热讽，充满轻视。与此相反，后来晚清王朝在处理中法越关系的过程中，虽本身已是危机重重，却仍是以一个大国的身份特别是从保护藩属国权益的立场出发，积极出面协调越法关系，只是拘于国力和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其中不免存在一定的妥协，最终调解结果也非其所能左右。然而在此期间应邀前来中国商谈与法交涉事宜的越南使臣阮述将阮朝陷入与法交涉的被动局面完全归咎于清政府的调停失败及其未能出兵相助，并谴责清政府保护藩封不力。^③ 如果以当时清王朝在协调越法交涉中的行为相比于越南明命朝对晚清中国时局的袖手旁观甚至冷言挖苦，显然晚清王朝仍不失是一个担负道义的

① [越] 张登桂等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209，“圣祖明命二十一年（1840）正月”条。

② [韩] 刘仁善：《19 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东北亚历史杂志》第 6 卷第 1 期，2009 年。据东北亚历史财团网站：<http://www.historyfoundation.or.kr/chn/>。

③ 参见 [越] 阮述撰、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有关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的抗法形势以及这一期间的中法交涉，学术界已有诸多重要研究成果，笔者不再赘述。至于晚清越南使臣及阮朝当局对清廷在中法越南交涉过程中有失客观公允的批评与指责，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亦暂不做具体讨论。